

中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与就业关系研究

舒元王曦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就业关系研究/舒元,王曦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3

ISBN 7-306-01902-3

I. 中… II. ①舒… ②王… III. ① 经济增长-影响-就业-研究-中国 ② 通货膨胀-影响-就业-研究-中国
IV. 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481 号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998、8403721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新会市棠下中学印刷厂印刷

(新会市棠下镇)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6 375 印张 160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定价:13.8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经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增长	(1)
第一节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制度改革指标的 构建	(3)
一、通过产权制度变迁引起生产组织和收入分配方式 变化的制度改革措施	(4)
二、市场交换的组织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12)
三、财政改革和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措施	(22)
四、对外开放的发展和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	(24)
五、我国经济转型的分类量化指标	(26)
第二节 我国经济增长的制度转型根源——理论与模型	(29)
第三节 实证分析	(35)
第四节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增长绩效	(43)
一、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	(43)
二、价格自由化进程	(45)
三、金融领域的改革与金融泡沫	(46)
四、财政制度改革	(49)
五、“科教兴国”战略	(50)
六、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51)
参考文献	(52)

第二章 经济转型中的就业与失业	(55)
第一节 我国就业决定因素的总体描述	(55)
一、就业弹性分析	(55)
二、投资与就业	(59)
三、技术进步与就业	(67)
四、教育对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意义	(73)
第二节 我国的就业结构	(74)
一、总体关系描述	(74)
二、三次产业的就业效应	(80)
三、其他结构分析	(83)
第三节 我国的失业问题	(89)
一、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统计情况分析	(89)
二、中国失业的混合形态分析	(92)
三、降低失业率需要多管齐下	(97)
参考文献	(100)
第三章 经济转型中的通货膨胀	(101)
第一节 我国通货膨胀的历程	(101)
一、计划控制阶段(1978—1984年)	(101)
二、中央银行直接信用管理阶段(1984—1993年)	
.....	(103)
三、中央银行宏观调控阶段(1994—)	(109)
四、小结:货币政策多重目标的矛盾	(111)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模型	(113)
一、传统通货膨胀理论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113)
二、中国通货膨胀模型	(116)
三、财政赤字和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118)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119)
一、综合模型的回归结果·····	(119)
二、影响通货膨胀因素的进一步分析·····	(121)
第四节 对于转型经济的启示·····	(135)
一、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136)
二、选择正确的货币政策目标·····	(138)
参考文献·····	(140)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增长、就业与通货膨胀·····	(142)
第一节 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142)
一、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检验·····	(143)
二、经济转型中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相互作用·····	(148)
第二节 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增长与就业·····	(155)
一、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56)
二、就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57)
三、就业结构转换滞后影响经济增长·····	(164)
四、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协调互促·····	(169)
第三节 经济转型中的失业与通货膨胀·····	(174)
一、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及其 变迁·····	(174)
二、菲利普斯曲线——中国的实证研究·····	(180)
三、结论·····	(184)
参考文献·····	(186)

序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何会有这种成就，应该从以往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怎么推进，就成为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学者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些研究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1978年以后的改革实践大体上分三个阶段，相应的研究也呈现阶段性的特征。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及在工业领域的放权让利是其中的总体思路，是改革的初步推进阶段。

实际上，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和相应的经济体制和制度的探讨并不是从1978年以后才开始的，1978年以后不过是改革实践真正开始大规模进行，此时改革的发起和领导人当然是邓小平同志。他所领导的改革的根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实际经验。查阅党史和相关资料可以发现，初期改革方案更多地是从以往经济建设中的失误总结出来的，其中正面的依据最主要是根据20世纪60年代以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对于国民经济管理的总体思路制定的，其中，改革和开放是精髓。邓小平同志提出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十大政策也主要脱胎于60年代的所谓“六大政策”。当时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并没有多少土壤，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未能提供国民经济管理的具体方法，所以这时候改革方案的确定并没有太多的理论依据，而主要是一种实际经验总结。初期的改革以渐进的方式推

进，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主要是由于当时改革从最容易的领域着手，因此使得改革者能够有机会实现经济的帕累托改进（即基本上在不损害任何人效用水平的前提下提高一部分或所有人的效用水平）。笔者认为，这时期改革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决策者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考虑中国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改革的展开和深化阶段。

受到前一阶段改革成功的鼓舞，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铺开。

在工业领域，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加大，改革的重点从放权让利深入到真正触及企业产权的内容。产权中的经营权开始全面改制，承包责任制、股份制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措施使得经营权和所有权逐渐分离。

价格领域，在1988~1991年的治理整顿阶段之后，改革进行了深化。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我国价格改革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取消了大部分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市场调节价的比重急剧上升。本阶段改革成为价格自由化的关键步骤。

金融领域，以银行商业化和中央银行独立化为目标的银行体制改革也开始全面展开，股票市场的出现成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80年代初以来，以贸易自由化和投资领域对外开放为主要指导思想的外经贸领域的体制改革逐渐展开。主要改革措施有：允许新兴企业进入贸易部门；削减指令性外贸计划，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外汇体制上推行汇率市场化；通过设立经济特区、税收优惠等措施，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种种改革措施使得我国的外经贸领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度由

1978年的不到5%迅速增长到1993年之后的20%以上。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改革尚有解放初的实践和经验可以借鉴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改革因为没有经验和理论可循，改革体现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改革者的胆识成为改革最重要的推动力。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有关改革讨论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增多，但仍然以经验性的研究为主。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学者对于现代经济学理论方法的认识和借鉴还刚刚开始，另一方面是由于改革的进程还不是很长，并不能提供足够多的数据。研究在理论性和规范性上还有待提高。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是改革的反省和调整阶段。

“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迅速推进，必然使得上一阶段的改革带有“粗旷性”的特点，并带来种种问题，经验性的研究也不能对微观制度安排提供系统和细致的建议。另外，由于改革的日益深入，改革逐渐触及到原有制度问题中的核心和敏感部分，改革推进的难度剧增。

工业领域，国企改革走到了关键的一步。我国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给予了重大的关注，以减轻国有企业负担为目的的众多改革措施纷纷出台；1997年党的十五大从法律形式上规定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分配权制度的转型合法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分配制度实际上已经意味着改革措施开始触及产权制度的根本内容——所有权制度。但是国有企业效益的不断下降和亏损面的持续增加，使得一些研究者开始思考国有企业的生存问题。

与之相对，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壮大，并对经济增长体现出愈来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金融领域的改革措施没有能够对于这样一种经济特点提供足够的资金和信息支持，由于种种原因，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仍是银行贷款

的主要方向。反过来，这也对我国的金融机构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银行不良资产等问题日益严重。我国虽然于1995年推出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并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为稳定币值，消除通货膨胀。但是，随着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出现了持续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的减缓，与之相应的是下岗和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收入分配领域的贫富差距和政府机构的腐败现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种种现象表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涉及制度的基础和制度设计的细节之后，急待反省和完善。问题的解决需由“理论”来指引。

一些学者开始逐步把现代经济学的内涵和研究方法引入进来，以分析中国的问题。国内的研究总体上遵循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用西方的模型和实证分析方法，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分析。单就这些分析本身来讲，它们是有用和必要的。但是国外的研究是在其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十分成熟和稳定的情况下做出的，而中国以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1978年以后，一直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之中，经济制度本身就一直处于一种变动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各种市场经济的制度还远没有完善；另外，中国经济本身的人文特征与西方也是不同的。因此，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就生搬硬套西方的模型和分析方法是有问题的。另一个方向是应用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来探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而事实上，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更加注重对于经济微观方面的分析。因此，国内学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单项制度改革措施效果和改革微观安排设计的探讨，对于宏观方面的研究相对落后。改革必须要有总的方向性指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游击战式的研究不可能是系统的，而且，缺乏宏观方面综合考虑的微观制度设计很可能是误导的。

从上面对于经济转型实践和研究的简单回顾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西方经济理论本身并不完善，也未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办法，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剧烈的制度转型的经济。因此，绝对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而应抓住它分析和研究方法的精髓。一定要很好地分析和真正掌握中国经济的特点，从中导出适合中国经济建设的正确方法。二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做出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空前的，并没有理论和更多的实践经验可以依据，改革还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行为，对于改革和经济过渡的研究也是百家争鸣，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科学体系。

可见，长久以来，“摸着石头过河”一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原则。这种“试错法”的思路在改革的初期可能是合理的。然而，“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既不能了解改革的后果，更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

我们的研究试图将现代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联系起来，利用实证分析工具，从宏观角度理论化、量化地探讨我国经济转型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分析其与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并讨论如何协调转型的长期和短期影响，从而为我国下一阶段经济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战略方针提供切实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我们的研究也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章讨论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增长问题。我们首先对 1978 年以来我国的经济转型进行简要的回顾，并把各种制度转型措施依据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的经济转型的客观的时间序列；之后，通过把经济转型作为广义

技术进步的形式，我们把经济转型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联系起来；实证分析就各种制度转型对增长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度给出了答案，从而从整体上评估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增长绩效。

第二章讨论经济转型中的就业和失业问题。我们首先对我国就业的决定因素进行总体描述，包括就业弹性分析，以及投资、技术进步和教育对就业的意义；之后从我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方面讨论三次产业的就业效应；最后讨论我国失业的混合形态问题，并提出降低失业率的具体措施。

第三章讨论经济转型中的通货膨胀问题。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历程进行描述之后，我们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并讨论财政赤字和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之后的实证分析给出了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因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选择正确的货币政策目标是解决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最终出路。

第四章讨论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增长、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首先对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因果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的根源在于：“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超敏感”的消费和投资以及粗旷的总供给增长；接着讨论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在分析就业及就业结构转换滞后的影响之后，我们强调了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协调互促的重要意义，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分析经济转型中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通过对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我们得出结论：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替代关系是存在的，原因在于转型以来，我国的经济环境事实上比较符合弗里德曼关于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界定的条件。

本书是国家教委“九五”社科规划课题《中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就业关系研究》的研究成果。舒元教授主持本课题的研

究，并研究课题的框架、理论和方法。具体分工中，王曦负责第一章，汤光华和徐现祥负责第二章，宾国强负责第三章，第四章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经集体讨论定稿，舒元和王曦对稿件进行了修改和定稿。本研究成果不但有赖于课题组成员的集体工作，也有赖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研究生在研讨班中的探讨和评议。本书的出版是上述各位共同努力的结果。

应当指出，我们的研究仍是探索性的。国内尚无类似的系统研究，国外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方法。由于作者的水平，我们的工作还是初步的。然而，我们愿意抛砖引玉，与读者共享我们的研究成果，以期推进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认识。书中的不当乃至错误之处，请读者不吝指正。

作者

2001年10月

第一章 经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增长

传统上，经济增长共有三种定义，它们是：①一个经济中生产能力的提高。在图像上，表现为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向外扩张；在数量上，表现为潜在总产出的提高。②一个经济中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③一个经济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的 actual 产出，或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理论上，第一种定义是最科学的，但是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原因，在实践中一般应用较少。第二、三种的采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所研究问题的性质。讨论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适用第二种定义；讨论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适用第三种定义。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实际总产出增长率 = 人均实际产出增长率 + 人口增长率。^①

讨论经济增长问题，还必须清晰地地区分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两个概念。如果经济增长是指长期内潜在总产出的增长趋势，那么经济周期则是指实际总产出围绕潜在总产出或多或少有规律的波动。讨论经济增长问题，更多地是与经济中要素（资源、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生产技术）的数量、质量和配置联系起来，因而主要是一种长期分析；而经济周期问题在更多地与总供给——总需求分析中的总需求方面相联系（近来，以 R. Barro 为代表的实际周期理论在内核上已经超出传统的总需求分析，但

① 人均实际产出增长率等于人均实际总产出 Y/L 对于时间的微分再除以 Y/L ：
 $\Delta(Y/L) / (Y/L) = (\Delta Y/L - \Delta L Y/L^2) / (Y/L) = \Delta Y/Y - \Delta L/L$ 即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率等于实际产出增长率减去人口增长率。

经济周期问题仍主要是总需求分析)。总需求分析主要是一种短期分析。

本文分析主要采用经济增长的第二种定义，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另外，除非针对某一具体问题，我们基本不谈经济周期问题，而主要讨论长期增长问题。

西方学者谈到经济增长，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二是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实证分析以及随之而来的少量关于增长政策的论述。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由非内生模型到内生模型的发展。前者的代表是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古典的索洛—斯旺模型；后者按照内生对象分依次有内生储蓄率的拉姆齐模型、内生人口因素的模型和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等。对经济增长的实证方面主要集中于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趋同和条件趋同（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al Convergence）方向的研究。在方法上，他们首先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率得出一个数理方程，即稳态经济增长率决定于技术进步及其它制度指标。然后通过收集整理很多个国家的跨国横截面数据，比较国家间稳态经济增长率的异同，并以此检验解释变量的作用。还有一些文献集中于某个行业的研究，分析该行业增长的决定因素。

总的来说，西方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还不能称为成熟，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理论和现实尚有一定的距离，并没有十分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理论上尽管各种假设一直在被放宽，如内生的储蓄率、内生技术进步、内生人口增长等的依次引入，但还是对现实问题的高度简化和模型化。并且，放宽一种假设的限制实际上意味着更多的主观假设约束被引入进来。如拉姆齐的内生储蓄率模型，它内生储蓄率的方法的额外假定之一，就是家庭追求无限时域上的效用流折现最大化。可见，在规范研究的领域中，存在着假定约束的怪圈。另外，经济学家对于增长问题的分析一直以“稳态增长”为中心点，一般假定经济中存在着不变

的稳态增长趋势。这产生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经济理论研究中
对“稳定”或“均衡”的一种执着的偏好，它实际上也是现代主
流经济学的三大核心之一。而现实中，很难说明这个理论上的稳
态增长趋势是否是稳定的。实证方面，相关研究集中于对经济增
长趋同性分析，或是对某个行业的分析，以及由此引出的一些对
于经济增长政策的讨论。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历史在各个阶
段的特点不同，这种分析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尤其缺乏针
对一个国家而设计的可以时间序列为基础的理论模型，而从一个
国家的增长和发展来说，时间序列模型由于避免了国家之间不同
文化、历史等的比较，它对于增长问题的讨论更有实际意义。不
成熟最终表现为还没有形成一套促进增长和发展的系统方案。否
则，现代社会也就不必为贫困化问题发愁了。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渐进改革过程，建立一
套有关我国经济转型的数量指标体系，是理论化和定量分析我国
经济转型增长绩效的前提，这是第一节的内容。有了这些数据，
我们还必须把经济转型的实践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联系起来，把
各项制度改革措施融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出适用于我国实
证分析的时间序列模型，这是第二节的内容。第三节和第四节
的内容是实证分析和结论。

第一节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 和制度改革指标的构建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渐进改革过程。为科学
地分析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首先必须对 1978 年以来诸
多的改革措施进行一个完整而又系统的分类。这套指标首先必须
是客观的；其次应该是分类完整和系统的，分类的完整性可以使

我们在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时不至于漏掉某种改革措施；分类的系统性可以使我们在实证分析时尽量减少不同制度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交叉解释，即在统计上尽可能避免制度指标的多重共线性。在本章的下一节，我们将结合对我国经济转型的回顾，构建我国转型的客观数量指标体系。

制度性指标必须参照制度改革的内容分类，并根据各种制度改革措施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方式和进程加以构造。根据各项制度和措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我们把制度指标分为：①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引起生产组织和收入分配方式变化的制度改革措施。②市场组织（交换）制度改革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③财政改革和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措施。④对外开放的发展和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指标。

注意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还会出现其它一些特征，我们将把它们和相关经济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分类说明。下面分别阐述。

一、通过产权制度变迁引起生产组织和收入分配方式变化的制度改革措施

（一）农业领域产权结构的变迁

改革以前，中国农村生产、组织采取“人民公社”形式，在公社内部，社员是在生产队的组织下集中劳动的。劳动收入分配形式以“工分制”为主要特点。在这种组织、分配制度下，由于一个社员多做的劳动所增加的是生产队的收入，而他只能得到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让队员增加劳动，也无法形成工分计算的有效监督，因此，制度问题引起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成为左右农业生产的主要思想和行为特点。1978年以后，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尝试实行的“包干到户”组织、分配形式为主要蓝本，“家庭承包责任制”迅速而自发地在全国农村地区扩散和推广。图 1

-1 展示了 1979~1984 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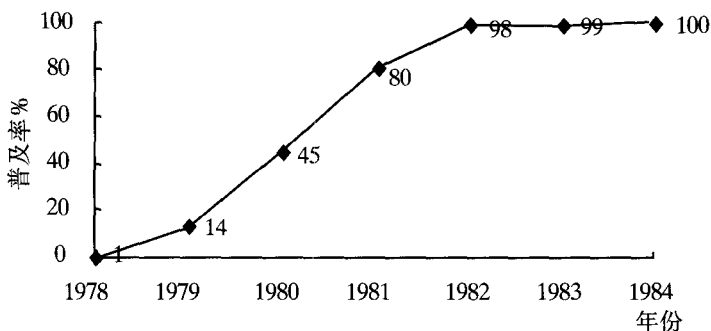


图 1-1 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普及率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产权结构的变化、价格的市场化进程和对外开放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我国的农业获得巨大的发展。1957~1978 年间，我国农业的增长率为 2.9%，而 1980~1985 年间则上升为 8.2%。农业在总产出的比例由 1978 年前的 29% 上升到 1983 年的 37%。

(二) 工业领域产权结构的变化

我国工业领域产权结构方面制度改革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二是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崛起和发展。1978 年以前，中国的工业部门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国有企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达到 80% 以上。这时，中央对企业经营和分配制度的管理以前苏联的计划体系为主要依据，国家对企业内部分配和企业外部产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这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组织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企业内部，职工缺乏足够的激励进行更多的劳动；在企业外部，统筹统分的计划制度使得企业缺乏自我发展的足够动力。从 1978 年开始，在一些国有企业内部进行了激励机制改革的试验。之后，由于农民收